



中國的統一與中國教會的統一

吳雁

(編者按：吳雁是台灣某著名大學的哲學教授)

一. 統一的條件和前景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渴盼中國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再團結，但是大家都認為，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在什麼條件下統一。就如當代中國的分裂，是中國人追求人權、民主與自由的過程中的一個大挫折與悲劇，痛苦的經驗使中國人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真正的統一與共融必須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天賦人權受到充份尊重、文化中國化並向世界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近年來，海峽兩岸的社會與政治體制都在快速變化。在台灣的人，過去數十年，雖然在創造一個民主社會方面，受到許多主觀及客觀因素的阻礙與禁制，但是從未放棄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理念。解嚴後，一黨獨大與專政局面結束，多黨政治體制迅速建立，人民的基本權利及自由日益受到重視與保障。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深具信心，使任何形式的獨裁統治不再出現。

在大陸，十年文革的結束，意謂中共終止了極端的鬥爭哲學，但是共產體制的徹底改革還很遙遠。經濟政策的開放與政治體制的保守所造成的矛盾，不斷困擾著中共的領導層、理論家和知識份子，也激出了一年前的民運和六四天安門的悲劇。一年來，世界各地的共產專政統治一個接一個地轉向，蘇聯的轉向民主也奇蹟式地出現了，全球各地湧出一股投向民主與自由的潮流，中共政權

也沒法子逃掉這一石破天驚的衝擊。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份子認為，中國人對統一的渴盼是迫切的，但統一的步調應該是分層而漸進的，即由文化、學術層面的交流到經濟、貿易的交流，再到政治的直接對話。循序漸進的理由是，統一不能以犧牲台灣兩千萬中國人的自由與民主前途為代價，而且在未能確定中共放棄專政統治的誠意之前，政治對話與談判是沒有意義的。

《聯合報》於九零年六月十五日公佈一項有關統獨的民意調查，指出未來統獨的演變，台灣的中國人認為中共實踐民主的誠意是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中共繼續一黨專政，而沒有改變的可能，那麼，就有四成二的人認為台灣應該獨立了。本報曾以不同條件詢問受訪者對統獨問題的態度，這是歷來各種問法所得到的主張台獨的最高比率。另一方面，如果中共真的實施民主自由，那麼，贊成統一的人達七成五，而堅持台灣應該獨立的人就只有百分之五了。」

九零年六月廿六日的《中國時報》報導了「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所做的民意調查，其中一些資料值得注意：

「對於目前既有政策，百分之五十一點二的民眾，贊成政府改變現行政策，與中共政權進行直接接觸，百分之廿三點

九表示不贊成，百分之廿四點八表示不知道或無意見；至於如政府有條件與中共政權進行接觸，其『條件』為何？百分之四十八點四認為應以『中共放棄武力犯台』為條件，其次為『中共放棄四個堅持』、『中共停止在國際社會上孤立我們』，另有百分之十點九的民眾認為『不需要任何條件』……

「兩岸通航方面，百分之七十二點二民眾贊成我們的飛機、船舶直航大陸，百分之十七點五民眾反對，百分之十點三無意見，中共飛機、船舶直航台灣方面，百分之五十點五贊成，百分之卅八點九反對，百分之十點七無意見……

「對於台灣脫離中國，成為一個新的國家，百分之七十一點四的民眾認為『不符合』台灣全體民眾利益，百分之十三點一認為很難說，百分之八點七表示不知道或無意見，僅有百分之六點八認為符合。

「對於兩岸關係未來展望，百分之五十五點六認為很樂觀或樂觀，百分之廿五點三認為不樂觀或很不樂觀；對於兩岸多少年以內可以統一方面，認為五年內佔百分之五點九、十年百分之十八點三、廿年百分之十一點六、卅至五十年百分之五點八、五十年以上百分之四點一、根本不可能百分之六點五。」

九零年七月四日結束的「國是會議」，在其大陸政策問題總結報告中指出：

「本次國是會議對於兩岸關係及大陸政策有相當大的共識。基本上，皆認為應以台灣人民的福祉為前提，考慮到國際形勢的限制、中共政權的性質、大陸人民的心理這些客觀因素，並且也要在能力範圍內，促使大陸走向民主自由，依

這些原則，來制定開放與安全兼顧的階段性大陸政策。」

二. 中國統一與教會統一的關連

中共統治中陸四十年，對待天主教的方式大致分兩種，一是在確認宗教只是意識形態問題或主觀心理需求的大前提之下，把宗教當作害人和阻礙社會進步的鴉片或劣質酒地加以掃蕩及徹底消滅。在解放前、解放初期和文革時期，中共都曾使用過此種方式。第二種方式是透過一些神職人員和教徒，成立中介性組織，用以統合整個教會，為政府和國家所推動的目標服務，此即中共的統戰方法。一九五七年中共促使天主教人士成立愛國會，一方面告訴教會可以在信仰方面服屬教宗，但是在政治、經濟和教會組織及活動方面，必須完全服從共產黨的領導，走獨立自主自辦的路線。中共認為這樣才符合已脫離帝國主義的中國的尊嚴。

此一推動中國教會獨立自主自辦的政策，自五七年以來，至今未變。其具體措施為發展愛國會、自選自聖主教、壓制地下教會。中共的政策已經導致中國教會的分裂現象，即使教會當局對於分裂的法律意義存而不論，但是分裂的事實是不容諱言的。此一分裂現象的形成，有許多複雜的歷史因素，甚至教會本身也負起相當大的責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無神主義的共產黨深怕宗教自由對其政權構成威脅。如果中共認真地持守四個堅持而不轉向民主，真正的信仰自由將難以實現。為此肯定中國在民主與自由的條件之下統一，是中國教會統一、與教宗和普世教會合一的先決條件，肯定二者之間有密切的關連，不是沒有理由的。因此作為一個中國的基督徒，盡其所能地推動中國的統一，因而促成中國教會的統一，應該是他義不容辭的時代使命。

三．海峽兩岸的交流

海峽兩岸民間的交流遠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灣開放探親之前，就已開始。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翁松燃教授所說，在開放探親之後，「三不政策變成不接觸但可交流，不談判但可帶話，不妥協但可緩和。三通四流在實質上已經多方展開。」（「六四以來台灣的大陸政策」，《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零年六月號五十七頁。）又說：

「總的說來，這一系列策略（發展民間交流、推廣台灣經驗、草擬兩岸人民關係法、籌設中介團體等），應可算是現階段台北新的大陸政策的主要內容。此一政策與務實外交配合，顯示台北意在維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謀求兩岸之間不定期地和平共處、平衡競爭、局部合作的關係的穩定發展。很明顯地，台北當局不復有『復國』之想。『六四』並未根本動搖中共政權，李登輝政府也未作顛覆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政權之任何部署，只有一般性的反共。

正因為政府當局的大陸政策未因『六四』而有所後退，所以民間的大陸熱也持續加溫。探親、旅遊、貿易、投資不斷增加，各種交流不息。然而，因為執政者特別關心安全（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樂）問題，而且未放棄反共和支援大陸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立場，還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也不肯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以免使台灣『香港化』，成為地方政府，所以對大陸活動始終不離民間、間接的原則。」

雖然一年來，台灣當局在研究、制訂大陸政策上較前積極不少，但是距離人民的要求尚遠。自兩岸開放探親以來，民衆一直希

望政府早日訂定一個積極、周全、主動、開明和有信心的大陸政策，而政府表現的卻是拖延、畏縮、被動和僵化。數年來已有數十萬同胞到大陸旅遊觀光，將海外許多訊息帶給大陸同胞，而政府至今不使旅遊合法化，致使這些人在心理上承受進行非法活動的負擔。站在基督徒的立場，我們願意向台灣當局作下列建議：

（一）我們認為制定大陸政策的基本原則應該是民族愛和同胞愛，只要對兩岸人民在物質及精神上有益的交流，政府與民間皆應鼓勵。我們認為有規劃地與大陸直接通郵、通航和通商，讓更多的大陸同胞，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公職人員，不論共產黨員或非黨員，來台探親、訪問；推動文化、學術、經貿等方面的交流；依台灣目前勞工的需求，有計劃地給大陸沿海地區人民提供工作機會，以堵絕不斷的偷渡及走私行爲，都將有助於全民族的團結與共融，當會減少海峽兩岸以武力解決衝突的可能。「國是會議」對兩岸交流也有積極共識：

「在策劃和處理兩岸關係方面，為了求戰略上的一致和呼應、戰術上的靈活和效率，發言人士一致督促政府從速設立專責的政策機構和授權的中介機構。大部分人士認為政策機構的決策人員中應包含無黨籍及在野黨的人士，其中有少數認為執政黨人士不應超過半數。同時亦認為中介機構的主持人應以省籍人士擔任。」

（二）兩岸人民的交流是互送愛心的工作，愛心便會生信心。台灣當局之所以在大陸政策上不夠開放，原因之一是出於對中共的戒心。明智的戒心應該有，但是把戒心變成恐共病就沒有必要了。其實今天中共對民主、自由的恐懼亦很嚴重。自「六四」之後，

中共當局一再宣示，大陸不能亂，內戰不能起，為此中共的專政與統治是必須的。一九九零年六月十七日台北《中央日報》引述香港《文匯報》的消息說：

「鄧小平認為穩定對於中國很重要，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他說中國大陸不穩，世界就不會穩。中國大陸打起內戰怎樣辦？中國大陸打起內戰是停不下來的，誰也無法讓它停下來。中國一亂，人口外流就是個大問題，誰也管不了。鄧小平舉例說，去一千萬到泰國，去一億到印尼，去五十萬到香港，香港還不大亂？而且，亂起來這些人還是有武裝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香港人應該最擁護我們保持穩定，應該舉雙手、雙腳擁護。對世界、對中國大陸、對地球有責任感的政治家就應該理解我們。」

《中央日報》又引述法新社的消息說：

「上海市長朱鎔基十五日在香港警告說，大陸的不穩及騷動將會導致全世界的混亂。朱鎔基在出席外國記者俱樂部會議時表示：『雖然某些問題存在中國人心中，我想我們有個共識，即中國一定要安定；中國的不穩和騷動將導致全球性的混亂，我想這也是絕大部分中國人有的共識。』」

透過兩岸的交流，我們可以主動地把中華文化的精華與優良傳統，把健全的人權、自由和民主理念，帶給大陸同胞。時至今日，台灣當局爲了怕中共的印刷品污染我們的精神，以致兩岸不能直接通郵，使我們許多有價值的作品，包括宗教的、哲學的、法律的、文藝的、政經的作品，不能普遍而大量地流入大陸，實在可惜。再者，文革後，許多富有學術與道德良知的大陸作家，獲得了較大

的寫作自由及空間，十年來產生了不少有價值的作品，包括對中國文化、宗教、哲學、歷史、藝術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補台灣文化與精神生活的貧血。

（三）海峽兩岸當局應順應民意，積極支持民間的接觸、溝通和對話，特別是文化、思想、學術、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交流。現在是民衆覺醒的時代，而且兩岸人民血脈相連，民族愛與同胞愛的匯合，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擋得住的。

在推動兩岸文化的交流中，宗教界人士的互訪、宗教方面學術研究的交流，以及在慈善事業、社會服務方面人力物力的合作，實爲重要的一環。宗教是中國文化的根，若要振興、革新中國文化精神，一方面須爲中國文化尋根，一方面須使中國古老的宗教信仰向影響現代世界最深的基督信仰開放。

七十年前，由於知識份子的無知、誤解與誤導，新文化運動爲了肯定科學與民主，極力把宗教從中國文化中趕出去。十年文化大革命悲劇使國人瞭解中國文化的根仍然深植在人民心中。文革後，中共把宗教看作統戰的對象，等於承認政治力量沒法子使宗教信仰自人心和中國文化的深處清除。最妙的見証是，文革後在大陸上出現了一批學者，由三十幾歲到六十幾歲不等，熱心研究宗教信仰問題，探索宗教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宗教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此一對宗教價值的再反省是非常寶貴的，也是在台灣看不到的現象。

（四）各種文化活動的交流，不只能夠激發民族共識與情感，也爲這共識與情感找尋更深層的根原，使兩岸隔離了數十年的心靈重新凝合與共融。爲了使國家在民主、自由、正義、和平與均富的條件下統一，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必須調適、革新、提升自己的心靈生活與精神境界，將內在與超越、入

世與出世、人性與神性的需求與渴盼結合起來，為中國人的心靈生活開展一條新路。有了光輝而充實的心靈，其他問題才能順利而合理地獲得解決。一九九零年六月六日《聯合晚報》報導台灣當局發言人邵玉銘對大陸政策的看法，有幾句話值得省思：

「我們對大陸，一定先文化出擊，改變其心靈。文化層面有了改變，才能以經濟作為深層變化的催化劑。至於政治的層次，現在根本不要談。只有中共在心靈、體質都有了改變，政治統一才能水到渠成。統一急不得，必須慢點來，過早的統一對雙方都是件痛苦的事。」

不過我們認為，心靈與體質的改變，在中共方面，固然重要，在台灣也有其必要，因為面對傳統儒家文化在現代中國社會中瀕臨破產的危機，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必須勇敢地負起責任來。

四. 兩岸教會的交流

中國的統一與中國教會的統一既然有密切的關連，作為一個中國基督徒，不能不關懷並盡力推動教會的合一，對於致力於中國的統一，也應體會到更深刻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一) 自從數年前，教宗明白告訴在台的中國主教團，努力作好橋樑教會的工作，每年都有不少神父、修女、教友到大陸探親、訪問，最近也有數位主教已到或計劃到大陸訪問。我們要運用種種機會，善意地建議中共人員，放棄四個堅持，順應世界和全民族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大勢，恢復私有財產制，尊重人民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權利及自由。我們更要不斷地呼籲中共當局，落實憲法，維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肯定宗教的客觀價值，放棄對宗教

不合理的干預與控制。無數的事實指出，大陸的天主教徒從未有過不愛國或違反國家主權及利益的企圖與行動。他們只想讓中共當局了解，服從教宗的領導、與普世教會共融，是天主教兩千年來信守不渝的道理，純屬信仰本質，絕對不會破壞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發展。為此我們期盼中共當局拿出勇氣與善意來，與地下教會人士對話，促進中國教會的和解。

(二) 我們希望在台的中國主教團，作為中國教會的重要份子，面對大陸的中國教會，應考慮訂定自己的主動政策，發揮積極影響力。福音東傳四百多年來，中國教會始終讓別人牽著鼻子走，致使福音中國化、中國基督化的工作一直沒法子進行。禮儀之爭及西方帝國主義保教權等歷史悲劇更使天主教在中國人心目中，至今抹不掉洋教的誤解與偏見。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推行教會在中國獨立自主自辦、主教自選自聖、不受外國勢力干預的政策，對大陸部分過去深受洋人壓抑的神職人員，顯然曾產生部份影響。甚至在八零年代的最初幾年，中共的「三自運動」和「教會獨立自主自辦」政策，也獲得一些地方教會人士的喝采，他們認為循此或許能為中國教會找出一條自己的路子。我們明瞭，上述中共政策不過是其統戰目標的一種策略而已。但自另一角度看，大陸教會的悲劇性遭遇，應該給我們一個反省的機會，努力為我們找出一條在中國傳揚福音更寬廣的路。畢竟要使基督的福音在中國土地上生根茁長，不能不認真考量福音與中國文化融通的問題。為推行此一工作，最為合適的人應該是已經吸收了福音精神的中國人。在過去一些年，在台中國教會曾下過不少功夫，認真探討真正的三自運動，並肯定在服膺教宗首席權、與普世教會共融的條件下，推行地方教會的自養、自治與自傳是可行之道。

目前在台灣建設一個中國式的地方教會的努力並未中斷，我們認為我們的許多經驗可以提供給大陸教會參考。

(三) 目前海峽兩岸接觸，對話與文化、經貿交流，在民間快速而普遍地展開，政府方面也日益主動地跟進，希望透過兩岸同胞間思想、情感、關懷的交流與合作，逐漸形成共識，進而使中國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中國化的條件之下統一。在此大形勢下，在台中國教會是不是也應該重新調整自己的腳步，更主動地、更有計劃地推動兩岸教會在信仰方面的接觸、對話、交流與合作呢？是否我們應該更積極地做好教宗所期盼的橋樑工作呢？我們深信教廷對大陸教會政策的最後目標，是全中國教會的合一與和解，以及與普世教會的共融。為達成此一目標，除了向天主祈禱和哀求之外，也不能不重視具體的行動。事實上，司鐸、修女與教友層面的接觸、對話與溝通近年來已經廣泛展開，在信仰中和解與共融的訊息也逐漸傳達給愛國會和地下教會人士。我們認為時機似已成熟，我們希望在台的中國主教團考慮組團到大陸去作宗教性訪問，直接與愛國會主教接觸、對話，把和解與共融的訊息、教宗的期盼傳達給他們，把地下主教們的想法與要求，亦即他們想說而沒有機會說的話轉告給他們。訪問團與大陸官方教會對話，只要我們立場清楚，坦誠溝通，地下教會人士當不致誤解。愛國會人士也不致拒人於千里之外，因為愛國會與海外教會，特別與在台教會接觸，是中共的既定政策。

在台的中國主教團組團訪問大陸，也可能有機會與中共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和其他宗教的領袖對話會談，當可把海外中國人及基督徒對大陸宗教自由政策的看法告訴他們，並介紹海外宗教發展的情況，促進雙方面宗教界的交流與合作。佛教星雲法師去大陸的

訪問，曾引起各界廣泛的興趣和積極的迴響。星雲法師能夠作到的，我們為什麼不能呢？

五. 中國基督徒的使命感

越來越多的跡象指出，在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之下，中國在變。大陸在變化，台灣也在變化，而海峽兩岸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皆願意為中國的統一而努力，並且積極尋求政治對話的可能和穩固基礎。李登輝總統就職後，就逐步展開主動的大陸政策，期以務實的態度規劃兩岸的互動模式，盡速設立有實效的機構及中介團體，妥善訂定兩岸關係條例，以打開對等溝通與談判的大門。

再者，動員戡亂時期的結束，象徵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台灣不再把中共看作一個敵對實體，當然也希望中共不再以武力威脅台灣。在「國是會議」的結論中有下列主張：

「對於兩岸交流的規範，有人提出在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應定位中共為對抗性的競爭政權。同時不能忽略，大陸為一集權體制，台灣則為一開放社會。我們一方面應積極進取，例如考慮共同開發海南島，聯合港、星與大陸成立共同市場等，以求縮短兩岸差距，增加共同利益，俾降低兩岸衝突之可能性。」

台灣不再以中共放棄共產主義為對話的先決條件，而只欲透過文化、學術、經貿的交流與合作，協助中共轉向民主與自由。要中共轉向民主與自由，需要極大的愛心與耐力，不以民主、自由為對話的先決條件，而以之為永不能放棄的目標，此乃一務實的作法，同時符合全民對民主與自由的渴盼，在此一堅實基礎上，中國的統一才有意義。

在這樣一個中國歷史的轉捩點上，面對這樣一個時代的訊號，作為中國人的天主教徒，必須要問自己，自己的時代使命是什麼？

自己應該如何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顯然，中國教會的合一問題是教宗和普世教會最關心的問題之一，而作為中國天主教徒的我們，自當付出最大的心力去解決自己教會的問題。在過去四百年中，因為我們自己站不起來，我們的問題是靠西方傳教士替我們作主、解決。歷史告訴我們，他們為解決中國教會的福傳問題所提出的方案與步驟，並不高明，也不理想。如果雷鳴遠神父早年所發起的偉大號召：「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不受到阻力而能落實實現，中國教會的分裂現象，很可能得以避免。

當代天主教在梵二大公會議的引導之下所展現的特質之一，是把源自神性啓示的和解、共融及對話精神帶給人類，帶給相互衝突、矛盾和敵對的人，並促使他們重視彼此間的諒解與尊重，進行交談，為了共同的福利而合作。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末期，此一和解精神已得到全球性的回應，民主、自由及重視人權的思潮及要求風起雲湧，許多專政體紛紛放棄鬥爭及暴力路線，轉向民意所要求的正義、平等與和平。我們中國天主教徒應虛心學習此一偉大和解及容忍精神，投入致力中國統一的艱苦工作，並使大陸的中國教會走出分裂的陰影，重回慈母教會的懷抱。

只有基督的愛能讓我們攻無不克。林瑞琪在《六四迴響——基督徒能如何為中國尋求出路》一文中說：

「要令中國社會能發生真正的民主改革，

最重要的一步仍是要尋求突破共產主義社會的互相監視；而對抗監視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個光明磊落的人；對一切人懷著善意，即使是冒被出賣的危險，也真誠地信賴你周遭的人；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心，破除心理障礙。東歐人民革命以勝利開始，（路途仍遙遠呢！）可說是愛心戰勝監視的明證。天主教會強調的愛心與共融，在愛德中合而為一，原是出於基督的感召，並非為對抗共產主義而設。但教會這一分非暴力的力量，在外教人士看來可能是軟弱無力的一著，卻剛剛擊中了共產主義的弱點。假如全球各地的天主教徒能真實地發揮愛心與共融的話，不但能為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帶來希望，且連共產主義者也可以在這和平的過渡中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公教報》一九九零年六月一日）

如果我們把所擁有的基督愛的情懷，與我們對大陸十一億人民所擁有的民族愛及同胞愛凝結起來，盡一切心力促使中國人歸基督，推動中國基督化的工作。我們也將會深深意識到，推動中國教會回歸基督羊棧，同屬教會的最高牧者基督和他在世代表教宗，會展現光明的前景，而且沒有人能完全代替或取代我們的使命與工作。

為賀聖神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而作
一九九零年七月十五日

鳴 謝

《鼎》十週年專號，承蒙胡振中樞機題字，各方友好惠稿，不勝銘感，特此鳴謝。由於篇幅所限，部份稿件將於下期十週年專號刊出。